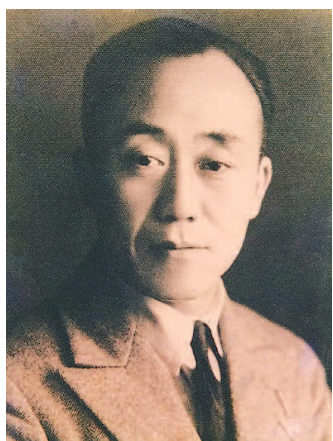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爱画尤入骨髓”的体育学家吴蕴瑞

戴炳炎

近日,上海市社联礼赞68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“上海社科大师”。上海体育学院首任院长吴蕴瑞榜上有名。吴蕴瑞提出“从体育一端着力救国”,“强健之身体,合作之精神,须于体育训练中得之”。回顾吴蕴瑞先生的生平事迹,恰可展现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的奠基与体育教育的开拓历程。

吴蕴瑞(1892—1976),字麟若,江苏江阴人;一级教授,上海体育学院创始人,并担任院长24年。曾任国家体委委员,上海市体委第二副主任,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,中国体操协会主席。曾先后在东北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中央大学(南京大学)等任教授、体育系主任,毕生致力于体育教育事业,是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、体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,是淹贯博通、硕学通儒、治学严谨的学者,且具艺术造诣,长于诗文丹青,被称为“中国自己的体育家”、“体育界唯一的通才”,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体育学界的代表,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五届代表。



吴蕴瑞

获教育学硕士学位。

吴蕴瑞在研究中发现,美国体育乃源于欧洲,其学理亦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。他决心追本溯源,赴欧洲考察,先后到了英、法、德等国,广泛接触专家学者,收集资料,对运动力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。他在考察德国陆军体育专门学校时,特地请专攻物理学的严济慈作翻译,并共同探讨运动力学问题。他的见解得到外国同行的赞许,严济慈也深为其精神所感动。

1927年10月,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邀请正在德国进修的吴蕴瑞担任体育系教授、系主任,重振东北大学体育。他欣然提前回国,主讲《人体机动力学》、《场地建筑与设备》及体操,深得师生的好评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他应聘为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。1933年8月,担任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。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,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,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,续任南大体育系主任,再执教鞭。

1932年,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,聘请吴蕴瑞为筹备委员会委员,参与起草编制体育法规。此前,他先后担任过教育部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常务委员,国民体育设计委员会委员,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,中华全国体育学会理事,江苏省第一、二届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评判部主任、总裁判等职。作为总裁判长,工作深入细致,作风严

谨,亲赴现场,查看跳远沙坑的沙子和跳高横杆的质量。

解放前夕,吴蕴瑞积极参加校内进步人士张江树等组织的护校委员会,不畏强暴,使学校免遭劫难,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,还支持协助一些进步学生去解放区投奔革命。

创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

1952年9月,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,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南京大学体育系、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科的基础上,筹建体育学院。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吴蕴瑞担任7人筹建工作组召集人。校址在梵皇渡路(现万航渡路)1575号原圣约翰大学(是年该校各院系已调整并入其他高校)。11月,政务院任命吴蕴瑞为华东体育学院院长。

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的第一任院长,吴蕴瑞根据办学方针,秉持现代体育教育理念,主持制订教学文件,引进高水平的师资,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,为学校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他以高尚的品格、渊博的学识、求贤若渴的精神,树起了一杆旗帜,一些留洋博士、硕士,体育界知名教授,“拳王”、“杠王”,纷

至沓来。据档案记载,当时的25名教师中,有7名教授,8名副教授,2名博士,2名硕士,6名欧美留学生,这在人才奇缺的建国初期,师资阵容堪称鼎盛。他组织6位专家,研讨制定第一份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编写教材等等。从筹备到开学仅一个月,基本完成了各项工作,保证如期开学。

1956年2月,华东体育学院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。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来上海为新校选址,吴蕴瑞院长陪同。6月,学校搬迁至清源环路650号(原为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,后为上海市行政干校校舍,仿宫殿式建筑,绿色琉璃瓦顶盖,通称“绿瓦大楼”。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已成上海体育学院的标志)。

吴蕴瑞亲自规划新校园,广泛征求意见。他常说,校园环境整洁、优雅,学生才能有好心情去读书、训练。他同绿化工人费澍等商量,建荷花池,造六角亭,在绿瓦大楼前,用小冬青栽培成“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”12个大字,全年常绿,与大楼隔路相望。大楼后绿树成荫,郁郁葱葱,生机盎然,令人心旷神怡。学校如今仍是上海市“花园单位”。

吴院长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他长期体育教学、学术理论研究实践的积累,逐步凝炼成“身心一统,德技相长,文理兼修,服务社会”的16字方

针,它符合体育学科的特点,涵盖了教学内容、教学要求、方法手段、培养目标等,为上海体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昭示了方向。即使在今天看来,与“立德树人”也是契合的。

“以解剖与力学,解剖各运动之科学也”

吴蕴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,即提出“体育学术化”的主张,强调体育的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。在他看来,人口众多的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成绩落后,主要原因是受古代“重文轻武”、“清静无为”等思想的影响,体育“缺乏科学之基础”,以至“体质羸弱”,被世人讥为“东亚病夫”。他认为,“体育为强国的基本”,并提出“从体育一端着力救国”,而“欲求进步,舍讲求科学方法岂有他道哉?”呼吁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,以解决体育上一切疑难问题。他身体力行,1922年即开始研究新兴的运动学,“以解剖与力学,解剖各运动之科学也”。解剖学论人体各部之构造与力之来源,力学论用力之方向、时间、速度等,使人体之各种运动合于力学之公式及定理,以生充分之效力。他一面到东南大学理学院听课,一面到运动场上观看学生运动。在教学训练中,不只是讲怎么练,更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这么练,从而使学生明白体育训练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,激发学生理论学习兴趣。学生说,按吴老师讲的方法练,事半功倍。

1928年他在中央大学体育系首次开设了《运动学》课程,并结合教学训练,“用全副精神修改整理”,1929年完稿后又请两位物理学家校阅,1930年通过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。1990年出版的《中华体育之最》一书



1950年代,吴蕴瑞陪同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视察上海体育学院校园